

## 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明代史学批评的互动关系\*

朱志先 (湖北科技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sup>①</sup>

在明代史学批评史上,传统的史学理论、批评理念、批评方法是一笔无形的宝贵财富,为明代学者进行史学批评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借鉴,尤其刘知幾所撰《史通》对明代的史学批评影响深远。同时,明代大量的史学批评实践,一定程度上又推动史学批评理论向更高水平发展,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恰如瞿林东先生所言,“从史学自身的意义上说,甚至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造就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sup>①</sup>“史学批评中总是会闪烁出史学理论的火花,而史学理论中则往往包含着史学批评的内容,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sup>②</sup>鉴于此,笔者拟从传统史学理论与明代史学批评的互动关系着手,考察两者之间是怎样进行互动,怎样成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一道靓丽风景的。

### 一、权舆准的:传统史学理论对明代史学批评的影响

中国传统史学理论蕴含着丰富的内容,不同历史时段特色各异,诸如经与史、文与质、繁与简、直书与曲笔、会通与断代、心术与名教、《春秋》笔法、实录、褒贬、信史、史权、史法、史意、史才、史德、良史等,这些理论似无形的指挥棒成为学人评判史家、史著及史学现象的标尺。明代史学评点兴盛,体现撰述理念的《春秋》笔法、史家素养的良史之才、史著水平的史家优劣等史学理论对明代学人产生莫大影响。

讲求属辞比事的《春秋》笔法,借助微言大义彰显其褒贬善恶的价值判断,逐渐成为著史及评判史著的一种范例。明代学者在面对华夷之辨及孰为正统的境遇下,《春秋》褒贬义例自然成为其评价史家史著的法宝。孙应鳌评丘濬《世史正纲》时言“持义当,其于取法《春秋》,以明人心之旨”;<sup>③</sup>何塘称《通鉴纲目前编》“取法于《春秋》《纲目》,其用心可谓劳矣”;<sup>④</sup>陈邦瞻赞誉谢陞《季汉书》,“得《春秋》之遗意”,使“正论始尽伸,僭渎不复容矣”;<sup>⑤</sup>李义壮言柯维骐《宋史新编》“击异以统同,纲举目随”,得“春秋之旨也”。<sup>⑥</sup>王洙《宋史质》序言中亦称“史者《春秋》之教也,论《春秋》者曰明三王之道”。<sup>⑦</sup>邵经邦甚至言“夫所贵乎良史者”,“其大要须存《春秋》之义,锱铢不可爽也”。<sup>⑧</sup>孙应鳌、何塘、陈邦瞻、李义壮、王洙、邵经邦俱以《春秋》之义为标准,对相关史著予以批评。尤其是谢陞在《季汉书》受到批评时,他盛誉自己的著作,“欲于列传之史,接踵范氏春秋之义,比肩习氏,奚不可哉?陈寿有知,固当心服地下矣”。<sup>⑨</sup>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明代史学批评研究”(项目编号:12YJC770079)的阶段性成果。

① 瞿林东《史学批评怎样促进史学发展》,《人文杂志》2016年第10期。

② 瞿林东《谈中国古代的史论和史评》,《东岳论丛》2008年第4期。

③ 丘濬《世史正纲》卷首《刻世史正纲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6年版,史部第6册,第150页。

④ 许诤《通鉴纲目前编》卷首《何塘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6册,第636页。

⑤ 谢陞《季汉书》卷首《季汉书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30册,第7页。

⑥ 柯维骐《宋史新编·序》,《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册,第313页。

⑦ 王洙《宋史质·叙略》,大化书局1977年版,第2页。

⑧ 邵经邦《弘简录·读史笔记》,《续修四库全书》,第304册,第182页。

⑨ 谢陞《季汉书》卷首《季汉书自序》,第14页。

在中国传统史学话语体系中,“良史”是评判史家主体及史学著述的重要标准,“塑造了古代史学的学术品格和史家的精神范式”,影响深远。<sup>①</sup>明代学者即以“良史”作为批评史家史著的标准之一。徐焯称《季汉书》“降魏为传,又著五十八论,真良史才也”;<sup>②</sup>吴应箕认为姚允明《史书》“非具良史才,又积岁覃精,行坚志特者,乌睹有是哉”?<sup>③</sup>唐世济赞誉沈朝阳《通鉴纪事本末前编》“素臣之业,良史之遗也”;<sup>④</sup>余铎称赵弼《雪航肤见》“为良史直笔,无庸喙矣”;<sup>⑤</sup>钱谦益言钱岱《两晋南北史合纂》“举要钩玄,或笔或削,盖称良史”。<sup>⑥</sup>

中国史学史发展的历程中,自《史记》《汉书》产生以后,史家们逐渐有意识地把众史放在一起,着眼于撰述体例、史料采择、叙事之美等评析史家史著优劣,进而形成一定的史学理论。这种辨析异同、褒贬史学的理论,推动了明代史学批评的多元发展。如文德翼《皇明法传序》言“郑端简《吾学》一编,洁体选言,庶几太史流亚;他则传者,惟陈氏《通纪》一书而已”,“钱塘高叟各取十五朝行事而汇集之,其为书大氏仿陈氏《通纪》而续之。然剜精铲采于叟之功为多”。<sup>⑦</sup>李贞《史窃序》言“二百年来,业班马者毋虑数十家,惟郑端简《吾学》与吾邑陈明府建《通纪》为最,然近代事未之详也”。<sup>⑧</sup>薛应旂《宪章录序》言“迩来见《通纪》仿编年而芜鄙,《吾学》效纪传而断落,遂不辞衰惫,尽出旧所录者,摘什一于千百,汇为斯编,与经世者共之”。<sup>⑨</sup>无论文德翼、李贞、薛应旂赞誉抑或诟病《吾学》和《皇明通纪》,史家褒贬之下,它们既是众人仰慕的对象,亦是学界批判的靶子。陈懿典在评价马维铭《史书纂略》时,对唐顺之《左编》、李贽《藏书》、邓元锡《函史》进行比较:“《左编》之作以二十一史为主,而旁搜稗史以成是编。近又有李卓吾之《藏书》、邓潜谷之《函史》,并行于世。然《左编》有义例,而无议论;《藏书》则本《左编》写,独见而为品鹭;《函史》外篇以缀八书诸志,内篇以君典臣谏本纪、列传。读者于《左编》则苦其端绪之多,于《藏书》则警其褒贬之怪,于《函史》则便其代各为系,而尤疑其挂漏之未免”,<sup>⑩</sup>而《史书纂略》与《左编》《藏书》《函史》相比,“虽相类,而用意周密,尤为过之”。<sup>⑪</sup>沈朝阳在评介其父沈越《皇明嘉隆两朝闻见纪》时,更是与陈建《通纪》、薛应旂《宪章录》、王世贞《国朝纪要》、郑晓《吾学》、高岱《鸿猷录》等逐一予以比较,评其高下。<sup>⑫</sup>查继佐评析明代实录、《皇明通纪》《吾学》《皇明史概》《皇明书》时,指出“《国初实录》时或有爱憎,且存忌讳。《通纪》略矣。《吾学》太质,以四六横纵故事,情未挚。《史概》信而芜,史料勤细,故良备,然似酷仿太史公文法。《明书》非自见之笔。嗟乎!难矣。”<sup>⑬</sup>陈懿典、沈朝阳、查继佐在批评史著时,非常灵活地运用史学褒贬的理论,依据体例、史料、繁简、叙事等标准对相关史著予以批评,纵横捭阖中展现了传统史学理论对明代史学批评实践的影响。

① 尤学工《“良史”与中国古代史学话语体系》,《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② 徐焯《笔精》卷6《季汉书》,沈文倬校注、陈心榕标点,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5页。

③ 姚允明《史书》卷首《姚伯子史书叙》,《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50册,第5页。

④ 沈朝阳《通鉴纪事本末前编序》,《通鉴纪事本末前编》,《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辑第15册,第351页。

⑤ 赵弼《雪航肤见》卷首《雪航肤见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94册,第233页。

⑥ 钱岱《两晋南北史合纂》卷首《两晋南北史合纂序》,《四库未收书辑刊》,第2辑第16册,第6页。

⑦ 高汝栻《皇明通纪法传全录》卷首《皇明法传序》,《续修四库全书》,第357册,第3—4页。

⑧ 尹守衡《皇明史窃》卷首《史窃序》,《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史部第64册,第10页。

⑨ 薛应旂《方山薛先生全集》卷13《宪章录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343册,第180页。

⑩ 陈懿典《陈学士先生初集》卷1《史书纂略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8册,第626页。

⑪ 陈懿典《陈学士先生初集》卷1《史书纂略序》,第627页。

⑫ 沈越《皇明嘉隆两朝闻见纪》卷首《自叙》,《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7册,第255页。

⑬ 沈起《查继佐年谱》,汪茂和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15页。

## 二、史学审美《史通》对明代史学批评的影响

刘知幾《史通》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其间含有丰富的史学批评理论。《史通》在史学自身的构成上,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论述,即史学渊源、流别、史学社会功用、史书编撰要求、史学主体修养和史学批评主旨。<sup>①</sup>对于为何要展开史学批评,刘知幾指出,只有通过对相关著述进行合理的批评,“辨其流”,“通其义”,明其“指归”,究其“本源”,才能使后人明晰其著述之旨。<sup>②</sup>况且,“明月之珠不能无瑕,夜光之璧不能无颣”。<sup>③</sup>任何著述都有优点和缺憾,只有采取客观的态度,才能更好地去认识、去批评。

《史通》蕴含着浓厚的批评意识和积极的批评态度,深深地吸引着大批明代学者去研读、批评,<sup>④</sup>乃至去继承和发展。像杨慎、于慎行、焦竑、何乔新、何良俊、詹景凤、袁黄、胡应麟、<sup>⑤</sup>陈文龙、朱明镐等,他们的评史文章一定程度都受到刘知幾《史通》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史家修养、史书繁简、史书体裁、史馆修史、评历代史书等方面。<sup>⑥</sup>以《史记》为例,刘知幾在《史通》大部分篇章里,对《史记》都有所批评,属于解剖式的细致分析,涉及《史记》的篇章结构、叙事风格及文字表述等。这是刘知幾对《史记》进行编辑技术层面的批评。<sup>⑦</sup>刘知幾此种评判理论亦可谓史学审美式批评,<sup>⑧</sup>对明代学人影响甚大。

在篇章结构方面,刘知幾认为史书的篇章结构,类似于国家的律令,只有规范的结构才能使历史史实更好地展现出来。<sup>⑨</sup>诸如《尚书》《春秋》“以日月为远近,年世为前后,用使阅之者雁行鱼贯,皎然可寻”,《史记》“错综成篇,区分类聚”,《汉书》秉承《史记》,“于其间则有统体不一,名目相违,朱紫以之混淆,冠履于焉颠倒,盖可得而言者矣”。<sup>⑩</sup>因此,刘知幾对史书的结构编次论之较多。对于司马迁将项羽纳入本纪,刘知幾认为“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sup>⑪</sup>“夫史之篇目,皆迁所创,岂以自我作故,而名实无准”。<sup>⑫</sup>对于史书编纂中名实是否相符的现象,明人亦论之较多。胡应麟称“史迁列羽纪也,班氏列羽传也,各有当焉”。<sup>⑬</sup>郝敬言项羽灭秦,分封诸侯,“已擅天下为帝王,为之本纪,非过也”。<sup>⑭</sup>凌稚隆认为《汉书》中各种合传,“虽不标立别名如儒林、循吏例,而同传之意自见”,因班固采取以类相从的原则,使具有相同特征的人物群体归于一传,从篇章结构的角度讲,颇得立传之法。<sup>⑮</sup>

① 瞿林东《论刘知幾〈史通〉关于史学构成的思想》,《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② 刘知幾《史通》卷7《探赜》,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页。

③ 刘知幾《史通》卷7《探赜》,第196页。

④ 参见朱志先《明代学者〈史通〉批评研究》,《华中国学》2018年春之卷。

⑤ 按:王嘉川在《胡应麟论刘知幾》中指出,“胡应麟应该是明代对刘知幾史学理论继承与发展的突出代表”,并且胡应麟在继承刘知幾史学理论的基础上,又予以“补弊救偏”和“批评指责”。参见王嘉川《胡应麟论刘知幾》,《史学月刊》2006年第4期。

⑥ 参见杨艳秋《刘知幾〈史通〉与明代史学》,《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⑦ 周文玖《刘知幾史学批评的特点》,《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2期。

⑧ 按:瞿林东先生在论析刘知幾的史学审美思想时,指出有叙事之美、史职之美、史学体裁之美、文章与文词之美、序例与论赞之美。参见白寿彝主编、瞿林东著《中国史学史》(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8—271页。

⑨ 刘知幾《史通》卷4《序例》,第81页。

⑩ 刘知幾《史通》卷4《编次》,第94页。

⑪ 刘知幾《史通》卷2《本纪》,第34页。

⑫ 刘知幾《史通》卷2《世家》,第38页。

⑬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13《史书占毕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页。

⑭ 转引自杨燕起等编《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46页。

⑮ 凌稚隆《汉书评林》,明治新刻东京印刷会所版,第1册,第26页。

在叙事风格方面,刘知幾讲求叙事之美。“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sup>①</sup>而“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sup>②</sup>。刘知幾指出,为史之美在于叙事,讲求文辞雅致,讲求简明扼要。明代学人受其影响,以注重叙事之美的方式批评史著者较多。何良俊称范曄《后汉书》“简而不漏,繁而不芜,亦可称名史,故世以与班固书并行,似不为过”;《三国志》“称为秽史,然其叙事简严质实,犹不失史家体格”;《晋书》成于众人之手,“最为冗杂”。<sup>③</sup>何良俊是从叙事繁简的角度评析《后汉书》《三国志》及《晋书》。杨慎就史文繁简问题,批评宋、元时期为文冗杂,像《宋史》“览之数过,亦不知其首尾”。<sup>④</sup>王圻则从叙事审美的角度,认为《史记》“疏荡”,《汉书》“跌宕”“有旨趣”,《后汉书》“无文气”。<sup>⑤</sup>王世贞在评析班固的行文时,指出班固叙事,“虽不得如化工肖物,犹是顾恺之、陆探微写生。东京以还重可得乎?陈寿简质,差胜范曄,然宛缚详至,大不及也”。<sup>⑥</sup>王世贞在形容班固叙事之美时,以顾恺之、陆探微的写生比拟之,并且和范曄、陈寿进行比较,字里行间透露出其对班固为文的赞美之辞。

在作史态度方面,刘知幾赞誉“肆情奋笔”“仗气直书”及“善恶必书”;<sup>⑦</sup>著史时,应“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sup>⑧</sup>明代学者在评判史著时,常常以直书、实录为准的。陆深称“史之为义也,不掩恶,不虚美。美者因其美以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恶而恶之,虽有其美不加誉也”;<sup>⑨</sup>杨慎曰“国史亦难信,则在秉笔者之邪正也”,<sup>⑩</sup>“史官直书时事以垂久远,其职分也”。<sup>⑪</sup>焦竑亦认为“夫记德之史,褒功之诏,传信于天下,史氏职也”,<sup>⑫</sup>而郑晓《吾学编》等书“多载懿行,而巨憨宵人幸逃斧钺,史称梃机,义不甚然”应“善恶并存”。<sup>⑬</sup>陆深、杨慎、焦竑赞成刘知幾的观点,亦认为著史者应直书其事,并以此来评判史家优劣。

### 三、守先待后:明代史学批评推动传统史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明代官修史书衰落,私人撰史兴盛,史评风气浓厚。史家不仅对历代正史予以评判,对当代史家、史著、史学现象亦是批评甚多。尤其是明代中叶以后,士人渐趋活跃,“或专讲心学;或放浪形骸;或放言高论,批评时政,一时风气丕变。其影响到史学,是激烈的史论出现。史学家以激昂之笔,褒贬人物,品评史事,千古史权,握于其手”。<sup>⑭</sup>对于此种现象,仓修良先生以“再度以褒贬为中心的明代史学”来概括其特征。<sup>⑮</sup>在史学批评的实践中,明代学者不仅以传统的

① 刘知幾《史通》卷6《叙事》,第152—153页。

② 刘知幾《史通》卷6《叙事》,第156页。

③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5《史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5页。

④ 杨慎《升庵集》卷52《辞尚简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70册,第450—451页。

⑤ 王圻《史评·诸史优劣》,《稗史汇编》卷98,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7页。

⑥ 凌稚隆《汉书评林》,第1册,第20页。

⑦ 刘知幾《史通》卷7《直书》,第180页。

⑧ 刘知幾《史通》卷14《惑经》,第374页。

⑨ 陆深《史通会要》下《丛篇一》,《伊山外集》卷26,《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85册,第150页。

⑩ 杨慎《升庵集》卷47《野史不可尽信》,第373页。

⑪ 杨慎《升庵集》卷2《丁丑封事》,第12页。

⑫ 焦竑《澹园集》卷25《少司农王公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55页。

⑬ 查继佐《明书》(罪惟录)列传卷18《焦竑》,《二十五别史》,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2535页。

⑭ 杜维运《中国史学史》第3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683—684页。

⑮ 仓修良《中国古代史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3—489页。

史学理论为的进行批评,同时,又丰富了史学理论的内容,推动史学理论向更高层次发展。

在史书撰述及史学批评中,史家修养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历代学者对此论之甚多。<sup>①</sup>刘知幾称史家应“仗气直书”及“善恶必书”。元代揭傒斯言修史者,“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本也”。<sup>②</sup>王祚称“公是公非,记善恶以志鉴诫,自非擅良史之才者,其孰能明公议,以取信于万世乎!故人主极天下之尊,而公议所以摄人主,公议极天下之正,而史官又所以持公议者”。<sup>③</sup>余继登称史官修史,“摭摭故实,备册书明示将来,用垂法戒。非一人之书,而天下之公也。非一时之书,而万世之公也”。<sup>④</sup>胡应麟认为史家的素养,“才、学、识三长足尽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笔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sup>⑤</sup>对于史家的素养,由刘知幾所言董狐直笔,揭傒斯讲求史家心术,王祚指出良史应秉持公议,余继登认为修史应有万世之公的意识,而胡应麟则认为修史者才、学、识之外,更应兼备公心与直笔。此种对史家修养要求的变化,实际是史家继承他人研究的基础上,在大量史学实践中感悟所得。<sup>⑥</sup>其实,在胡应麟之前,薛蕙对修史者已提出了四种要求,即史家应“深于道德”“通于政教”“明于人情”“精于文艺”,唯有如此,才具备良史资格。<sup>⑦</sup>

有关明代史学存在状态的经典概述,当属王世贞所论。其言曰“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sup>⑧</sup>王世贞归结明代官修国史因“人恣”而“蔽真”,私修野史因“人臆”而“失真”,私撰家史因“人谀”而“溢真”。明代以来,学者们在评价明代修史状况时,多会直接或间接引用王世贞此论。卫承芳《明政统宗叙》言“明无史,非无史也,夫人而能为史也。夫人而能为史,何以无史?弇州氏言之矣,‘国史之人恣,野史之人臆,家史之人谀。谀者可以益小人,恣者不免诬君子。臆者可以乱一时耳目之实,恣者不免殒万世斧袞之公’”。<sup>⑨</sup>卫承芳是直接引用王世贞之论来支撑自己的观点。

更多的是间接引用王世贞有关国史、野史、家史的论点,或是因袭其说而未予以注明。如祝世禄称“夫家史兴而善失真,美而溢者也;野史兴而善涉谬,传而误者也;稗史兴而善入讹,琐而鄙者也……至弇州以论著高,一代国故家乘,异同亡所不订,阙疑无所不考,沾沾命世。”<sup>⑩</sup>张岱言“第见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sup>⑪</sup>陈登云则言“世之以纂述自号者,其弊多端”表现为“挟隙而多诬”“轻听而多舛”及“好怪而多诞”。<sup>⑫</sup>祝世禄、张岱属于对王世贞观点的间接引用,而陈登云则属于因袭王世贞之说。王世贞关于国史、野史、家史的论断备受明代学者关注,说明此论对明代修史状况的批评颇有道理。实际上,王世贞此说亦是在明代众多批评实践中延伸而来,经过不断积淀,最终形成在理论方面的经典概括。在王世贞之前,郑晓、杨慎等

① 参见瞿林东《心术与名教:史学批评的道德标准和礼法原则》,《文史知识》1991年第11期。

② 宋濂等《元史》卷181《揭傒斯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186页。按:明代王文禄《海沂子》中亦言“或问修史,海沂子曰:心术正,上也;文次之;学次之。”见王文禄《海沂子》卷3,《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5年版,子部第84册,第363页。

③ 王祚《王忠文集》卷15《唐起居郎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6册,第323页。

④ 余继登《修史疏》,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437,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779页。

⑤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13《史书占毕一》,第127页。涂山《明政统宗·凡例》中亦言“论史之为职要,秉天下之公心以裁天下之公典”。涂山《明政统宗》,《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2册,第107页。

⑥ 参见毛春伟《明代学者论历史撰述中的“心术”与“公议”》,《求是学刊》2010年第5期。

⑦ 薛蕙《约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84册,第294页。

⑧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20《史乘考误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1页。

⑨ 涂山《明政统宗·叙》,第93—94页。

⑩ 黄光昇《昭代典则·序》,《续修四库全书》,第351册,第2—3页。

⑪ 张岱《柳塘文集》卷1《石匱书自序》,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⑫ 吴瑞登《两朝宪章录》卷首《自序》,《续修四库全书》,第352册,第496页。

学者对明代国史失职、野史不真,已有论析。郑晓称,“我朝虽设修撰、编修、检讨为史官,特有其名耳。《实录》进呈,焚草液池,一字不传。况中间类多细事,重大政体,进退人材,多不录”,<sup>①</sup>“国朝小说书数十种中,亦有浪传不足信者。惟《野录》中一事极可恶……好事者为《野录》,遂妄言耳”。<sup>②</sup>杨慎指出“历代皆有国史,而往往不无舛漏。于是岩穴之士,网罗散失,摭摭逸事,以为野史可以补正史之阙。然野史不可尽信”。<sup>③</sup>按:郑晓、杨慎有关明代国史、野史修撰中存在弊端的论述,要早于王世贞,不管王世贞在著述中是否参依过郑晓、杨慎之说,至少可以说明王世贞的史学批评理论并非空穴来风,应该源于明代史学批评的实践之中。

### 结 语

明代中叶以后,文学复古运动兴起,由评点《史记》《汉书》进而演进到对相关正史的批评。随着官修实录的流出,私人撰史层出不穷,水平高下不一,明代学者纷纷著书立说对此现象予以评论。而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流播,尤其是《史通》为明代史学批评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参照,有力推动了明代史学批评实践的多元发展。

明代学者在前人的理论上,对于如何展开批评,纷纷提出自己的理论思考。焦竑言,“学道者当尽扫古人之刍狗,从自己胸中辟取一片乾坤,方成真受用,何至甘心死人脚下”。<sup>④</sup>即作为学者应该具有批评意识,但这种批评不能像刘知幾“多轻肆讥评,伤于苛刻”,<sup>⑤</sup>“凡作议论文字,须令核实无差忒乃可”。<sup>⑥</sup>鉴于“论人之著作,如相家观人”,焦竑指出欲客观评析他人著述,应“得其神而后形色气骨可得而知”,“不得其神,未可论其法,不知其人,未有能得其神者”。<sup>⑦</sup>当世人对班马异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时,徐孚远指出其中的玄机“夫构文之家重神简,征实之家采事迹,此二者所为折衷也。”<sup>⑧</sup>钱谦益进而认为对于班马优劣,应“得古人作史之指要”,<sup>⑨</sup>“读班、马之书,辨论其同异,当知其大段落、大关键,来龙何处,结局如何”。<sup>⑩</sup>钱氏主要从作史的角度,指出在辨析班马异同时,应把握古人作史的要领,不能仅满足于讨论《史》《汉》的文辞,不仅要知其然,还应知其所以然,这样对班马异同的评判在理论上更上一个层次。

明代大量的史学批评实践拓展了史学理论的内容,使其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诸如《史通》中言及六家、二体,剖析不同史著之差异。焦竑在参阅正史时,发现同一作者之著述,亦有体例不同之现象。他以李延寿所作《南史》《北史》、欧阳修《唐史》《五代史》为例,提出“史笔纪载不同”“史法之异”的观点。<sup>⑪</sup>对于明代实录中,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员才能立传,焦竑则希望修国史时,应该“贵贱并列,不必以位为断”,“善恶并列,不必以人为断”。<sup>⑫</sup>胡应麟以著者为例,对历代正史予以评判,提出“圣人

① 郑晓《今言》卷2,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6页。

② 郑晓《今言》卷1,第15页。

③ 杨慎《升庵集》卷47《野史不可尽信》,第373页。

④ 焦竑《焦氏笔乘续集》卷2《支谈上》,《焦氏笔乘》,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87页。

⑤ 焦竑《焦氏笔乘》卷3《史通》,第124页。

⑥ 焦竑《焦氏笔乘》卷1《二疏赞误》,第18页。

⑦ 焦竑《澹园集》卷22《题词林人物考》,第284页。

⑧ 杨燕起等编《历代名家评〈史记〉》,第25页。

⑨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83《书史记项羽高祖本纪后二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751页。

⑩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38《再答苍略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0页。

⑪ 焦竑《焦氏笔乘续集》卷6《史法之异》,《焦氏笔乘》,第455页。

⑫ 焦竑《澹园集》卷5《修史条陈四事议》,第30页。

之史”“贤人之史”“文人之史”“乱人之史”“小人之史”及“夷人之史”的观点。<sup>①</sup>陈深《诸史品节·凡例》中言,“批评亦有三品”,即佳品、神品、妙品。<sup>②</sup>明代史学批评实践为传统史学理论的凝练与升华提供了很好的试验场,使史学理论呈现出缤纷色彩。

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明代史学批评之间的良性互动,明代学者批评他人著述及被他人所批评,这种学术自觉一定程度上也促进明代史著的繁荣发展,“不仅表现在史书编撰,更表现在对史学理论问题的思考和对历史的批判,表现在实学精神下对史学经世之旨的强调和对史学严肃性的坚持”。<sup>③</sup>并且,“在这不断地自我批评和自我克服之中,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史家和史著,把明代史学的发展逐步推向了高潮,为明清之际出现的史学高峰,奠定了思想和学术的基础”。<sup>④</sup>

## 史学批评与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邹兆辰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史学批评是伴随史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常现象。历代史家根据当时社会和学术发展的需要,在继承前人的著史理念、体例、方法进行史学撰述时,往往还会对前代学人的著作进行整体的或局部的评论,提出或褒或贬、或有褒有贬的论述。也有少数史学评论家从史学发展的整体角度对前人的历史著述进行总结性评论,提出一些问题。这种现象一直贯穿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中,但长期以来史学史并没有形成一个学科,缺乏对于史学批评现象进行系统性的总结、研讨,直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由于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当代中国史学家才能对古代史学批评进行学理性的探讨。

发现并提出史学批评的问题,需要对中国史学发展有系统深入的研讨,对史学史有深厚的学识积累,还需要有敏锐的学术反思精神,能够对史学批评的各种现象进行理论性的思考。瞿林东先生从1964年起跟随白寿彝先生研读中国古代史学史,在教学科研实践中,从集中关注唐代史学扩展到整个中国古代史学,撰写了通贯性的中国史学史著作。在长期读史过程中,深刻地察觉到中国史学史上这样一种现象,他强烈感受到这种现象是推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一种动力,有必要认真加以梳理,于是他以“史学批评”的名目,开始对其进行了持续、系统研究。从1991年1月起,他在《文史知识》上开辟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专栏,连续发表系列文章,并于1994年汇集为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一书。此后二十年里,他始终致力于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问题的探索,陆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于2016年又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增订本)》。2017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瞿林东文集》(第二卷)即《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的几十篇文章,也都在不同层次上涉及史学批评问题。此外,瞿林东先生自2016年起主持的教育部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已经结题,并于近日推出多卷本《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将会把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推向新的高潮。瞿先生开创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成为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新领域,同时史学批评的研究也推动了史学理论问题研究的深入,成为促进史学理论

①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13《史书占毕一》,第127页。

② 陈深《诸史品节·凡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32册,第3页。

③ 瞿林东主编《中国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252页。

④ 向燕南、张越、罗炳良《明清时期(1840年前)·中国古代史学的嬗变》,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